

引言

2022 年中國的外交地位在許多方面與 1966 年的法國相似。的確，戴高樂將軍於 1966 年 9 月 1 日發表了著名的金邊演說，他在演說中肯定了“人民自決的權利”，非正式地將法國置於不結盟國家一邊，還對美國侵略者發表了有先見之明的講話，預言“亞洲人民不可能屈服於太平洋另一邊的外國人的統治”。美國政府對法國政府的不滿已有多年。事實上，在戴高樂和莫里斯·顧夫·德姆維爾二人的領導下，法國的外交官們經常對英美霸權國¹置若罔聞，在國際舞台上獨立行事，這也成為法國外交的標誌，直至 2007 年雅克·希拉克的第二個任期結束。這一標誌代表的是一種另類的、無黨派的聲音，在重大地緣政治問題上受到全世界的尊重和期待。

1964 年 1 月 27 日，即金邊演說前兩年，繼 1958 年開始與美國

1 霸權國：從華盛頓特區經倫敦延伸至布魯塞爾的超國家政治實體，通過實施其單獨制定並替代國際法的規則，對其在歐洲、中東和亞洲的附庸行使統治權。其目的是通過軍事和金融脅迫，在全世界推行美國式的自由民主。

和英國展開長期鬥爭之後，法國成為第一個與社會主義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西方國家。法國勇敢、務實的立場至今仍為中國人銘記在心。

事後看來，我們才知道，戴高樂將軍大膽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只不過是一系列挑戰霸權行動的開始。

法國早在 1965 年就將其國際收支順差向美國政府兌換黃金（這給美元造成了巨大壓力）¹，在 1966 年就對美國入侵越南提出了批評，同年法國退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軍事一體化機構，1967 年作出法國央行退出黃金總庫的決定（導致英鎊崩盤），並對“自信和專橫的人民”在巴勒斯坦實行的擴張政策提出婉轉但擲地有聲的批評。由此引發了現代西方的第一次顏色革命，即“五月風暴”，戴高樂也因此於 1969 年被迫辭職。

1 Monnet, Éric, *Une coopération à la française. La France, le dollar et le système de Bretton Woods, 1960 — 1965*, Histoire Politique, Centre d'histoire de Sciences Po, 2013/1, n.19, p. 84.

第一章

2022年的中國不再是
鴉片戰爭時期的中國



1.1 戴高樂主義外交與莫拉斯治理

習近平主席領導的中國發現自己正處於同樣獨特和面臨挑戰的外交地位。在大西洋主義陣營國家看來，十多年來，中國政府與當年的法國一樣，一直表現出同樣的高傲態度，而且中國更加令人惱火，因為中國擁有世界上第三強大的軍隊，與俄羅斯一樣，也是最具戰鬥力的軍隊之一。¹

西方媒體一貫將中國的 30 年經濟增長描述為“傲慢”，認為 30 年結束之際，中國將走向霸權主義，發動全面戰爭。原因有三個。

第一個原因：中國在技術創新方面發揮了核心作用，逐漸取代了西方國家在軍事優勢和軍事威望方面的主導地位。

第二個原因是象徵性的：中國的治理在許多方面都呼應了查爾斯·莫拉斯（Charles Maurras）的“整體民族主義”學說，揭示了西方自由主義模式的過時和崩壞，以及在應對世界走向多極化體系時的不足。

第三個原因是最重要的：中國模式的成功使西方新殖民主義所有的失望具象化，也揭示了真正的霸權主義。也正因如此，中國現在成了西方一些神經過敏的媒體以及政客攻擊的對象。

1.2 國際關係中謹慎但重要的角色

中國是 21 世紀初所有重大地緣政治舉措的核心。

1 《2021 年軍事實力排名》，《全球火力指數》，2021 年。

RCEP 協定於 2020 年在東盟框架內制定，並於 2022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從區域範圍來看，中國是有史以來最重要的自由貿易協定——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的幕後推手。西方媒體對此的沉默，充分體現了這個新的區域組織在西方引發的擔憂。該協定旨在將 15 個亞洲簽署國的關稅降低 90%，這些國家的人口佔世界人口的 30%，創造了世界貿易的 30%，儘管印度因仍在觀望而缺席。令人遺憾的是，不斷尋求加入國際組織和條約的中國台灣地區，儘管對該區域的所有國家或海關實體開放，但仍不適合加入這一自由貿易協定，而中國香港特區則於 2022 年 2 月獨立申請加入。

在世界舞台上，中國也自然而然地擔當了金磚國家（BRICS）集團中老大哥的地位，在上海成立了新開發銀行，在 G20 峰會上是多邊主義的擁護者，願意擔任全球南方國家聯合起來反對英美霸權的代表。其“BRICS+”倡議計劃將金磚國家成員擴大到南方國家以及包括南方共同市場、上海合作組織、歐亞經濟聯盟、東盟—中國自由貿易區、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等區域集團，並將多邊合作擴大到經濟合作以外的領域。

中國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的創始成員國，這是一家最初為亞洲國家設立的公共投資銀行，但現在對有意加入的非洲、亞洲及其他各大洲國家開放。現已有 57 個國家加入，其中大多數來自西歐、非洲和金磚國家。亞投行的目標是取代亞太地區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組織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為改善亞洲經濟和工業互聯互通所需的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資金，與中國

在全球範圍內實施的“一帶一路”倡議相輔相成。

中國和俄羅斯都是上海合作組織¹的創始成員國，該組織成立於20世紀90年代，旨在解決中亞地區的安全問題（宗教原教旨主義、恐怖主義、分裂主義）。當時美國進入該地區，利用蘇聯撤軍留下的真空，在其兩個主要對手俄羅斯和中國的後院製造了一個無休止的混亂區域（即阿富汗）。

在歐洲中心建立軍事基地（穆斯林佔多數的科索沃地區邦德斯蒂爾軍事基地）數年後，美國這個霸主又在烏茲別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建立了兩個軍事基地。與烏克蘭、瑞典和芬蘭的情況一樣，這代表著北約在事實上進一步延伸到了中國和俄羅斯的家門口，遠遠超出其欺騙性的名稱縮寫“北大西洋”之範圍。

因此，中國及其參與的所有地緣經濟計劃，都引發了英美新保守主義鷹派及其歐洲附庸國的憤怒。自柏林牆倒塌和蘇聯解體以來，他們已不習慣與另一個“可以說不”²的國家爭論。新保守主義者沃爾福威茨（Wolfowitz）1992年的理論主張將任何可能對霸權構成挑戰的國家扼殺在萌芽狀態，但已被中國打破，並且在某種程度也被俄羅斯打破。

中國推行“真正尊重文化差異的文明聯邦”³的外交政策，與臭

1 前身為上海五國會晤機制，創建於1996年。

2 宋強，《中國可以說不：冷戰後時代的政治與情感抉擇》，中國文聯出版社，1996年。

3 喬萬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亞當·斯密在北京：21世紀的譜系》，倫敦，沃索出版，2007年，第393頁。

名昭著的新保守主義反恐戰爭截然不同。2001年9月11日之後的二十年，無論在何處實施，這種帝國主義政策顯然都是失敗的：不僅給中東的一些國家造成了毀滅性打擊，而且弔詭的是，也加速了其霸權的衰落，並逐漸將中國置於地緣政治棋局的中心。經過四十年的經濟發展，中國可以再一次被“民族文明”的概念所定義，和俄羅斯等國家一樣¹。

中國在經濟和外交上的崛起，是美國這個霸主重回公開敵視中國的外交政策的原因。從1949年到1978年，除了少數西方漢學家和政策專家外，大部分西方人都對中國不那麼感興趣，從1978到現在，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在四十年來一直無情地預測中國即將崩潰，高速經濟增長也將終結。他們像精明的戰略家一樣，在西方與中國之間每一次新的摩擦中都看到了衰弱、混亂以及即將崩潰的跡象。但是，年復一年，中國每一次經濟和科技進步，每一次外交勝利，都證明了他們的錯誤，但他們基於對現實的否定以及意識形態假設的信念也愈加強烈。當他們指責的中國“罪惡”隨著時間的推移自然而然地消失時²，他們很快就會代之以越來越不可能的指控，以贏得一無所知的西方公眾的支持。

因此，西方的媒體和政客們不斷編造關於維吾爾人、中國南海、

1 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論俄羅斯人與烏克蘭人的歷史統一性》，2021年7月12日（上次訪問日期：2022年7月20日）。

2 中國西藏自治區現在很繁榮，也很和平；中國城市的空氣污染指數正在急劇下降；獨生子女政策已經修改，鼓勵家庭生三胎。

中國人口老齡化等問題的爭論，目的都是為了製造關於中國的負面信息。西方公眾系統地且不情願地見證了幾十年來在英美霸權的“廚房”裏炮製的關於中國人的各種想像的可恥偏見。

1989 年，為實現政權更迭，美英霸權試圖將北京部分民眾的不滿示威變成一場“顏色革命”，但以失敗告終。此後，這個霸主對中國失去了興趣，直到 2008 年的金融危機，在西方突然衰弱的形勢下，中國在金融危機中受影響較小，反而愈加強大。

英美“深層政府”（Deep State）接管了好萊塢那些無能的“仇華”和“親藏”人士，開始了一場誹謗和系統性騷擾中國的運動，並且一直持續至今。

這場戰爭（的確是一場戰爭）儘管還沒有正式宣佈有任何人受到傷害，但這是一場潛在的衝突，一場永久性的誹謗和挑釁運動，因為這個霸主從其自己進行的多種模擬¹ 中意識到，其沒有足夠的軍事資源來贏得與中國之間的軍事對抗，除非考慮使用核武器，但這將使北半球變得無法居住。

1.3 霸主發動的不對稱戰爭

霸主並不樂見自己在“快樂全球化”中失去影響力和聲望，因為它是全球化的發起者和主要受益者，而中國在這場運動中以有競爭力的價格成為全球供應商，並且將始終滿足於這一身份。

1 《美國在戰爭遊戲中“輸掉底褲”：240 億美元的代價，突破防禦》，2019 年 3 月 7 日（上次訪問日期：2022 年 7 月）。

西方媒體重複的西方衰落理論既是一種精明的論調，也是一種策略：霸權主義者的衰落是其在世界各地奉行的反覆無常的外交政策所帶來的必然結果。但這種西方衰落理論為霸主在與中國的交往中奉行咄咄逼人、高人一等的政策提供了理想的藉口。西方寡頭政治及其媒體將中國正式視為“生存威脅”或“系統性競爭對手”。

像之前的戴高樂一樣，中國領導人不得不耗費大量精力來撲滅霸權主義者在中國領土及其周邊地區引發的“大火”。

自 2003 年以來，在美國領事館的官方支持和華盛頓民主黨陣營的公開鼓動下，霸權主義者多次試圖在中國香港發動“顏色革命”，在中國新疆挑起民族宗教騷亂，美國中情局、好萊塢與印度合作在中國西藏¹ 挑起騷亂，在中國南海一再發起軍事挑釁，極具侵略性的印度民族主義重新抬頭，這些都是非常明顯的實例。

霸權國及其附庸國正在對中國發動一場非對稱的低強度戰爭，效仿其對俄羅斯、伊朗、朝鮮和委內瑞拉發動的戰爭。這種衝突的不對稱性在於，在一個混合的地緣政治、商業、文化、社會和軍事領域，摩擦點不斷增加，以便在適當的時候，有藉口對中國的非侵略性行為進行報復（實際上是攻擊），而中國對此的“報復”實際是為了回應西方的又一次挑釁。

英美“深層政府”的參與者都非常清楚這些仍然擁有主權的地區大國領導人的心態。在 2015 年於索契舉行的第 12 屆瓦爾代國際辯論

1 現在處於和平狀態的西藏自治區是中國發展最快的地區之一，2019 年全區 GDP 增長 9%。

俱樂部年度會議上，弗拉基米爾·普京所表現出的自信就是這種心態的總結：五十年前，我在聖彼得堡的街頭學到一條規矩：如果戰鬥不可避免，那就先發制人。¹

霸權主義者要做的就是不斷挑釁中國的防禦性軍事姿態，讓這場戰爭不可避免（就像俄羅斯在八年挑釁之後對烏克蘭的干預），並在完全掌握於西方工業集團手中的國際媒體上，將這場戰爭歪曲為一場“不正當的侵略戰爭”，同時也為西方以國際法、民主和正義的名義作出軍事響應提供藉口。

霸權主義者及其附庸國有計劃地在中國的家門口不斷挑釁中國，迫使中國做好防禦準備，從而藉此譴責中國發起軍備競賽，為其在恰當的時候發動軍事進攻提供藉口，媒體將這種進攻稱為“先發制人的防禦”。這種做法在 1967 年的“六日戰爭”（第三次中東戰爭）期間得到完善，並於霸權主義者在全球各地發動的持久戰爭中付諸實踐。

與普京領導的俄羅斯、霍梅尼及其繼任者領導的伊朗、薩達姆·侯賽因領導的伊拉克、塔利班領導的阿富汗、米洛舍維奇領導的塞爾維亞、查韋斯領導的委內瑞拉以及最近的越南和朝鮮的情況一樣，西方媒體將妖魔化敵人思維逐漸灌輸到西方公眾的潛意識中，而這樣一種論調也預示著即將發生的帝國主義侵略。

20 世紀 80 年代，即使像日本這樣的附庸國家，也部分擺脫了帝國主義的監護，政治和媒體戰爭機器開始運轉。附庸國一方面是霸權

1 《弗拉基米爾·普京與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成員會面》，《第 12 屆年度會議最後一次全體會議簡報》，2015 年 10 月 23 日（上次訪問日期：2022 年 7 月 20 日）。

國家的盟友，但也可能會突然成為被摧毀的敵人。對於一個妨礙霸主霸權的附庸國，不論這種妨礙是否出於自願，霸權國都不會吝惜任何捏造、誇大或“幌子”式的攻擊。

1.4 這證明中國的新型代辦級外交是合理的

這種不對稱戰爭迫使中國重新定義與西方的關係。中國已經意識到，不再能夠僅僅通過國際法的視角以及國際法和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確立的國際關係準則來審視國際舞台。

新世界秩序雖尚未宣佈，但業已建立。在這樣一種秩序下，西方民族國家機器被剝奪了主權，淪為日常管理和制定對內政策的輔助職能機構：貨幣、邊境和司法已轉移至超國家體系控制之下，而國防、衛生和教育方面的特權不斷遭到寡頭政治的劫持。

中國正逐漸意識到，儘管自 1949 年以來一直在穩步加強自己的主權，但中國無法繼續與那些僅僅披著主權外衣的國家“坐下來談”。

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有了了一席之地，一隻腳踩在其仍希望建立的“國際協同體”（Concert of nations）之上，即昨天的世界，另一隻腳踩在西方寡頭政治強加的軍事金融秩序之上，即今天的世界。西方寡頭政治的各種參與者，他們並非無國籍，而是擁有多重國籍，但不再尊重國際法，為此，他們正試圖用叢林法則取而代之，並將之重新命名為“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

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霸權國制定的一套模糊規則，適用於整個世界，凌駕於國際組織的法律框架之上。這套自由主義規則的目的是基於自由主義價值觀已被普遍接受的誤導性假設，為自封為“世界警察”的霸權國干涉他國內政的行為尋找說辭：自由派自由主義民主、不受限制的經濟自由主義、軍事人道主義干涉或新保守主義。這種英美概念與 1648 年以來主導國際關係的威斯特伐利亞秩序正相反，後者以國家對其領土和人口享有不容剝奪的主權以及主權國家平等原則為基礎。冷戰結束以來，霸權國在發動侵略戰爭時經常援引這種基於規則的國際新秩序。

對於西方披著合法外衣的野蠻行為，中國和俄羅斯一樣，明白傳統外交只能導致短暫的妥協和不穩定的協議。

自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為強行建立華盛頓所定義的民主，這個霸權國保留了隨時干涉他國內政的權力，而不徵求包括其所謂的“盟友”在內的其他參與者的意見。但正如俄羅斯外交部長謝爾蓋·拉夫羅夫所指出的，“一旦我們談到國際關係民主化，特別是摒棄傲慢以及按照國際法的普遍原則而不是規則行事的意願，霸權國就會立即對對話失去興趣。”¹

鑒於霸權者制定自己的規則，在國際法規則之外利用代理（或第

1 俄羅斯聯邦外交部長謝爾蓋·拉夫羅夫，《關於法律、權利和規則》，莫斯科，2021 年 6 月 28 日（上次查閱日期：2022 年 7 月 20 日）。

三方)¹ 向其他地區大國發動戰爭，中國與俄羅斯一樣，也正在發展一種新的代辦級外交形式。

因此，在解決與歐洲小國的爭端時，比如立陶宛突然敵視中國的爭端，北京方面明白，布魯塞爾試圖將爭端中的貿易問題提交世貿組織（WTO），而政治問題將在華盛頓而不是在布魯塞爾解決。維爾紐斯像一顆棋子一樣上躡下跳，無論是升級還是緩和華盛頓強加給它的這場衝突，它都沒有決策權。但是，就像被華盛頓利用而挑釁俄羅斯的烏克蘭一樣，維爾紐斯將獨自承受這一針對中國的新帝國主義式挑釁所帶來的苦果。

中國外交早在西方人之前就已經明白，歐盟實際上是一個敵視中國的受外國勢力（美）控制的國家聯盟²，但中國與歐盟主導國家的雙邊關係卻是友好且富有成效的³。中國也意識到，歐洲國家的主權職能早已移交給布魯塞爾以及華盛頓，故而其與布魯塞爾的談判永遠不會像與華盛頓或世貿組織談判那樣有成效，也因此其將只與歐洲各國就次要問題（氣候會議、國際體育比賽、關於特定農業或工業產品的雙邊協議等）進行談判。

儘管歐洲國家改變事態的機會極其有限，但並非不存在，北京方面會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但不是像那些惡毒的言論所暗示的那樣，

1 烏克蘭對俄羅斯、巴基斯坦對印度、日本和中國台灣地區對中國大陸、摩洛哥對阿爾及利亞、厄立特里亞對埃塞俄比亞、哥倫比亞對委內瑞拉、阿塞拜疆對伊朗等。

2 外國勢力統治的政權，來自希臘語 xenokratia，xenos（外國）和 kratos（權力）的組合詞。

3 《環球時報》報道，習近平與默克爾舉行視頻會晤，彰顯了兩國之間的深厚友誼，為進一步推動中歐會談鋪平了道路，2021 年 10 月 13 日（上次查閱日期：2022 年 7 月 20 日）。

意欲分裂和統治，而是出於對繞過歐盟層面的顧慮，因為歐盟對霸權是屈從的。在重大地緣政治和經濟問題上，中國外交將繼續與歐洲主要國家和布魯塞爾進行談判，保全中間對話者的面子，以免破壞未來可能有用的任何橋樑，但華盛頓和國際論壇（包括像達沃斯這樣的非正式論壇）仍將是其優先對話者，因為這些才是國際關係的真正參與者。

中國正通過這種方式逐步與俄羅斯聯合。俄羅斯仍處於與西方鬥爭的前綫，並於 2021 年 10 月決定停止與北約談判，而直接與華盛頓對話。

除德國以外，其他歐洲國家都被中國和俄羅斯視為輕量級選手，這些國家彼此之間無法和睦相處。雖然歐盟內部是禁止法德對抗，但在歐盟之外，這種對抗的激烈程度從未減弱，而法德在中國的迂迴式競爭，破壞了歐盟希望展現的團結形象。

我們可以看到，西方普遍主張的這種自由民主正在西方陣營內部，以及在被征服的西方國家與仍然擁有主權的國家之間的關係中引發多重衝突。就像一個對疾病作出反應的機體一樣，一種反西方政治與文化抗體的產生過程逐漸顯露，俄羅斯及中國外交的突變就是明證。

1.5 拒絕西方漸進式模式

在針對中國發動的混合戰爭中，像俄羅斯和某些東歐國家（比如匈牙利）一樣，中國不僅有物理邊境需要加強防禦，而且，最重要的